

4715.00

怀安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忠心耿耿为人民的一生

——阮慕韩同志革命事迹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怀安县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序.....	张友渔 (1)
一、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5)
二、赤子之心与报国之心.....	(8)
三、一切为了驱除日寇瓦解顽敌.....	(12)
四、执法如山 培植良才	
脱胎换骨 育成新人.....	(20)
五、还田于民 献宅于学.....	(25)
附印影件六幅	
六、发挥政策威力旧貌变新颜.....	(33)
七、团结友爱 克己奉公的人民好市长.....	(39)
缅怀革命业绩 建馆世代纪念.....	(44)
于振华同志在《阮慕韩纪念馆》	
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46)
呼和浩特市党政代表团团长、常务副市长	
巴图苏和在《阮慕韩纪念馆》揭幕仪	
式上的讲话.....	(51)
阮若珊同志在《阮慕韩纪念馆》	
揭幕仪式上致谢词.....	(54)
(附照片三幅)	
阮慕韩同志生前友好晚辈所作纪念诗词六首.....	(57)

儿时的回忆.....	阮崇武 (60)
怀念我的父亲阮慕韩同志.....	阮若珊 (66)
编后语.....	(76)

序

张友渔

怀安县政协编辑的《忠心耿耿为人民的一生》并附录慕韩同志生前领导友好题词及其几个子女的回忆文章，如实地再现了慕韩同志为革命而奋斗的一生。

慕韩同志是我的老战友。一九三三年，我认识他于北平。当时我在党的北京市特科系统作上层统战工作和搞文化运动。党组织让我同慕韩同志和王右铭同志（即王思华）组成一个核心小组，进行工作，我担任组长。我们每星期在我家里碰头一、二次，传达党的指示，讨论问题，布置工作，有时，需要开比较人多一点的会，因我只租住一间房子，并且是同房东住在一个院里，为了避免惹人注意，常在慕韩同志家里开会，并且有客厅，开会很方便。慕韩同志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那时他的职业是大学教授。他给我突出的印象，既不像大地主家庭出身，也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生活朴素，工作热情。只要是工作需要，哪怕是跑腿的事，他也竭尽全力去完成。他在统战工作方面，主要是同西北军上层人物有联系，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将军退居天津，要同我党联系，曾经慕韩同志找我，我介绍给在天津领导特科工作的南汉宸同志。慕韩同志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作风的朴实，常使我感动。

有一件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一九三四年，因为他同我一道工作的关系而被捕。那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世界日报》总主笔，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授，作为进步文化人同反动派进行斗争。例如在民国大学新闻学系一九三四年毕业典礼上，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对学生作报告，要新闻工作者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效力。我兼该校新闻系主任，在讲话中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毕业的学生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因此，就被他们认为“粉红色”教授，只是慑于舆论，不敢轻易加害。由于市委特科同我联系的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我，于是宪兵第三团副团长丁昌亲自率领宪兵、特务、警察数十人，一个夜里包围我家来捕我。可巧我临时接受党组织的临时任务去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我向报馆请假三天，当天下午晚班后，没有回家，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赴山西了，他们摸了个空，但他们并不甘心，留下数人在我家“蹲坑”。过几天，慕韩同志去我家找我，经“蹲坑”的特务盘问后，报告他们的上级，到慕韩同志家中逮捕了慕韩同志。他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通过他在狱外的社会关系营救出狱，他积极找组织关系，同南汉宸同志接上头，继续为党工作，曾积极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到太原不久，因国民党政府追捕我，党组织让我暂离太原去日本。何梅协定后，又回太原工作。一九三六年夏，被调回北平工作。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到慕韩同志，他被捕的这段遭遇时常萦绕我心头，深深地思念着他。

我回到北平后，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工作，慕韩同志又协助我工作。王世英同志常住

天津，每一、二星期到北平一次，由我约慕韩同志来，三个人在我家里开会。王世英同志传达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我和慕韩汇报工作，共同研究问题，布置工作。当时，我们把推动华北五省二市当局抗日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慕韩同志负责联系察哈尔主席刘汝明的工作。小组印刷传递宣传品等具体工作也由他领导几个青年同志去完成。这一年，我们接触甚多，相知更深。

七七事变后，我和慕韩同志先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我走时把家里的东西存放在他家。解放后我来到北京，发现他家的老保姆董妈还为我保管着这些东西，使我惊讶不止，同时深深感到慕韩同志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连他家的老保姆也受到了熏陶。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韩幽桐和慕韩同志奉华北局的命令去太原汇报工作，接受新任务，我们同许德珩夫妇、程希孟夫妇一道从天津乘船到烟台，转乘私人的长途汽车到潍县，再搭乘火车到济南。一路上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许程两家，慕韩同志做得很好，既热情又仔细。到济南后，许、程去南京，我、韩幽桐和慕韩同志去太原。

在太原，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召集南汉宸、王世英、我和慕韩同志开会，决定王世英留山西，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南汉宸也留太原，和阎锡山搞“山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我去山东联络局任书记；慕韩同志仍继续做刘汝明的工作。

从此，我和慕韩同志再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以后，我和他匆忙地相逢几次，每次都来不及尽情畅谈。一九三七年底我从山东撤退时，中途在济宁时，曾遇到慕韩同志，匆匆

见了一面，他还介绍我同刘汝明的李参议见过面。一年以后，我随石友三部队从山东开到河北，听说慕韩同志在冀中工作，可惜没有见上面。直到十一年后，在华北，我才又见到阔别之久的慕韩同志。他当时任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市法院院长。听说他在担任察哈尔高级法院院长时曾把自己的地主家庭的三千多亩土地献给了人民政府，献给了贫苦农民；还听说他在法院工作的建设上也很出色。我们见面时，他一句也没谈自己的贡献，还是那么朴素、谦虚。他的妻子张耀湘同志，多年来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正积极要求入党，我给她写了个证明材料。以后，又是各自东西，各忙各的工作，多年不见。

解放后，我在北京见过他一次，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一九六四年，我听说他来北京治病，住在友谊医院。我去看望他，因为我太忙，又怕他累着，也没有多谈。他带着病回到他工作多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次看望竟成为我们的诀别。

我怀念慕韩同志，怀念他和地主阶级决裂、彻底革命的精神；怀念他没有个人主义的打算，艰苦朴素，一生为革命的高尚情操；怀念他严格掌握政策，在司法工作中作出光辉建树。

一、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阮慕韩同志于一九〇二年出生于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的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其父阮培元因病逝世，其祖父阮维勋多年在外地任职，由于受清末康梁维新变法的影响，对当时时政感到厌烦与不满，于是决心为振兴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竭尽自己的力量。他辞职卸任回乡后，用他自家的资财办起两所学堂——一所男校，座落在城西的十王庙内；一所女校，就设在自家外阮的南大厅。当时，“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十分浓重，妇女在街市上公开出头露面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因此，女学生上学，均由阮家派轿车运送。为了办好这两所学校，他专门请了一些德高望重的有开明思想的先生任教。这一行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是需要有胆识与社会舆论同封建思潮抗衡的，何况又在一个只有方圆二里的小城堡内首创新学呢。这充分表现了他兴办新学、废除私塾、抵制科举的强烈的反封建学制的思想，更反映出他敢于向禁锢人们头脑的世俗观念——封建礼教的挑战。这对慕韩同志幼年的成长与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受到良好的影响。

到阮慕韩这一代，他有三个姐姐，只有他是唯一的男孩，因此格外受人喜爱，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当他刚刚“呀呀”学语的时候，祖父就经常教他识字，这对他儿时即获得启蒙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五、六岁时就经常出入

学堂内外并且能背诵很多诗词了。八岁时，祖父决定让他正式入学，给他起名叫铭琪，字慕韩。因为他年龄小，父母又对他格外娇惯，舍不得让他一人去男校上学，为了有姐姐们的照顾，于是就让他在女校就学。在学校内，由于他才思敏捷，又勤奋好学，门门功课从不落人之后，尤其是写字、造句、作文成绩更是名列前茅。在女校，因为只有他是个男孩，因而有时也产生孤独之感，为了能和同学们接近，探讨学问，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他竟不惜心甘情愿地作为人家谋取一笑的“工具”。如大家玩起“捉强盗”的游戏时，他就主动地要求当一名挨刀杀的“强盗”，让别人砍自己的头。这件事被老师知道后，称赞他甚有涵养，能伸能屈，颇有大将韩信气质。两年后，他才上了男校读书求学，由于他特别爱好钻研文学作品，学校一位国文老师见他是一个好苗子，就开“小灶”下功夫专门培养他。他写的文章、诗词以及书法等作品，经常挂在成绩牌上，让全校同学参观、学习。老师还经常把他的优秀作品拿到女校展览，鼓励女校学生也向他学习。

慕韩同志十五岁时，奉父母之命，与女校一位品学兼优的“尖子生”——张耀湘结婚。婚后夫妻之间互敬互爱，更由于当时他俩分别考取中学，受到新思潮影响，彼此在政治思想上十分一致，他们立志努力学习，探求真理，所以尽管妻子比他大六岁，但夫妻之间的恩爱始终如一，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条件好坏，甚至长期的别离，夫妻间都能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尊敬。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这对张耀湘已经是柴沟堡女校的校长，在丈夫慕韩的影响与鼓舞

下，她敢于挣脱旧社会给妇女套上的封建枷锁，积极领导学生上街宣传、游行，带头破除迷信，光荣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当时慕韩同志正在通州（现在的北京通县）潞河中学读书。由于他从从小就受到新学的熏陶和教益，在青少年时期又耳闻目睹旧社会政府腐败无能，危害人民以至民不聊生的惨状，萌发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难，慕韩同志中学毕业后就到日本庆应大学深造。

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利用种种借口在我国东北三省进行挑衅，企图制造各种事端来满足其侵略的狂妄野心。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突然袭击我国沈阳驻军，由于蒋介石推行反共卖国政策密令国民党军队不许抵抗，致使沈阳及东北全境相继沦陷。身在日本的我国热血青年，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无不义愤填膺。慕韩同志常常把自己的住处做为我国留日学生聚会的场地。他们共同谈论国内外形势，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质，决心要为反侵略而学，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学。大家宣誓：哪里有压迫那里就要有斗争，凡我中华儿女都必需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巨流之中，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慕韩同志在庆应大学毕业后，即回国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他在进步思潮影响与感染下，自觉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彻底背叛了地主阶级立场，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踏上了他的光荣的革命征途。

二、赤子之心与报国之心

三十年代的中国，神州大地正处于日寇铁蹄之下，“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灾难更加空前深重，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人民饥寒交迫，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已到了苦难重重、危在旦夕之际，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慕韩同志毅然从日本归国，在北京、天津两地担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可是，我东北三省的沦陷，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救亡烽火到处燃起。救我人民，还我河山的爱国抗侮激情促使慕韩再不能坐在书斋里教书治学了。这时，慕韩同志与共产党员鲁仲平有了密切的生活和工作上的联系。在鲁仲平的启迪下，慕韩阅读了有关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与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革命理论的书籍与文件，并且时常听取鲁仲平讲解当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与红军进行革命实践的情况，于是在两个主义与两个党派的对比下，他觉悟了，清醒了。他怀着报效祖国与背叛地主阶级的赤子之心，于一九三一年十月由鲁仲平介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终身。从此，他走上了为祖国解放，民族振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的革命道路。由于他出身于大地上家庭，又是留日回国的教授，较易隐蔽，因此，党分派他在大城市做党的地下工作（是当时的特科成员），主要负责团结和组织文化界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不顾个人安

危，勇敢接受了这一任务。那时，张友渔同志是党的华北联络局的负责人之一，又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与黄松龄、杨秀峰、吴晗、徐冰、慕韩等同志一起从事唤起高级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爱国救民的工作，同时先后办起了《世界论坛》、《时代文化》、《文化动向》等刊物，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这些刊物慕韩同志都参与并亲自撰稿。此外，他还积极地在一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工作。

当时，他的外甥贺一平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利用自己的亲属关系，经常教育和启发一平多读进步书籍，并鼓励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在多次观察中，感到他思想进步，非常可靠，于是也经常让他做些传送物品、信件等秘密联络工作。有一段时间，还让他代收写有“交张国良收”的一些信件，转送慕韩同志。

慕韩同志利用教学工作与学生接触较多的机会，经常耐心启发教育青年学生的爱国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当时慕韩同志除在北平中法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外，还兼任天津法商学院的课程。有一次，他问法商学院的一位学生庄林为何选学日语，庄只回答为了多掌握一门知识。他却开导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我们国家，我们学日语正是为了彻底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反动本质，从而我们才能战胜它”。“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指示庄林“你们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也应有所表示啊！”于是庄林联络了很多同学立刻向奋起抗战的十九路军发出了慰问信。一九三三年，喜峰口抗日寇侵略的战争时，又在慕韩同志的启发下，法商学院学生会组织了以庄林为团长的慰问团，到战地慰问了抗敌将士。回校后，他们还组织了报告

会，使广大学生都深受教育和鼓舞，激发了他们爱国主义的热情与行动。

蒋介石一向是假抗战，真反共的。一九三一年，他在南京接见请愿的学生时，却欺骗他们，胡说什么抗战要有个准备过程，还信誓旦旦地说：要用自己的脑袋来保证，三年后一定会打跑日本鬼子。庄林当时也参加了请愿，由于年轻，他们认为蒋介石既然是掌握全国军权的军事委员长，而又肯用自己的脑袋来做担保，看来真的是要抗日了。过了两年以后，有一次，一些学生在慕韩同志家中聚会时，慕韩问起庄林是否相信蒋介石真的会抗战？庄林天真地说：“蒋介石说抗战要准备三年，现在才过两年嘛。”慕韩笑着说：“蒋介石如果诚心诚意地要抗战，为什么他不支援抗日十九路军、二十九路军呢？其实蒋介石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和慈禧太后是同样的观点，‘宁予外寇不给家奴’啊！”慕韩的一席话，使在座的人听后感到异常震惊，促使他们开始重新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慕韩同志还利用在北平中法大学和天津法商学院两地同时任教之机，积极开展京津两地的学运工作，沟通两地的学生的密切联系。一九三五年，天津“一二·一八”学生运动后，在他的周密安排下，北平学联负责人董毓华和天津学联负责人庄林在阮的住处相见，讨论了成立平津学联事宜。十二月二十六日，平津学联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并组织了扩大的南下宣传团。宣传团到保定、高碑店一带农村，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的宣传，历时一个多月，最后被迫返回北平。

一九三六年二月，平津青年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简称“民先”。（注：现在党中央规定凡参加“民先”的人，从参加“民先”的那一天起，就算参加革命工作了，并以此计算工龄。）在党组织和慕韩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庄林还参加了全国学联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由一个单纯幼稚的青年学生，成长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战士。

与庄林同期成长并走向革命道路的还有一位叫刘及辰。刘及辰在天津法商学院（1935——1937年）时期，与慕韩同志形影不离，情同手足，并悉心帮助及辰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当时，刘及辰撰写的《如何认识我国危机》、《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黑格尔哲学的方法与体系问题》、《差额地租论》等篇论文，都是在慕韩同志关心指导与协助下写成并出版的。在慕韩同志引见下，刘及辰得以和党组织发生了联系，经张友渔介绍，又结识了平津许多有名的进步人士。从此，这位知识渊博的人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刘及辰在1964年得知慕韩病逝后，悲感交集，沉痛不已，写了一首怀念的悼词。

亲如手足情如渊，
每苦无依思往年。
命佐渔公作联系，①
晓将大义道里边。②
一朝风火从北起，
君上战场我南迁。
总望有缘话离别，
今何不幸哭永眠。

注：①渔公，指张友渔同志而言。

②里边。指延安而言。这是慕韩谈话时，常用的代名词。

三、一切为了驱除日寇瓦解顽敌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战斗的号角吹响后，在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慕韩同志即奉命离开北平（当时北京名为北平）奔赴抗日战场的最前线——晋察冀边区。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成立了行政委员会，他担任了行委会社会通讯联络部部长。

1937年9月，边区政府组建游击军，党委派慕韩同志做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当他初到游击队时，队员们听说派来一位大知识分子，都怀着敬佩和惊讶的心情欢迎他。但是看到他胖胖的身躯，矮矮的个子，戴着一付眼镜子，说话低言细语、文质彬彬，于是好多队员便私下嘀咕：“这样一位文弱书生能经受得了打游击的艰苦吗？”

慕韩同志一插手工作，就从外地来的青年学生中和当地参加抗日的教职员中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抗日宣传鼓动队，亲自草拟和审核抗日宣传材料，并教会队员喊日语口号——“日本士兵弟兄们，不要替日本军阀财团打仗送死！”“八路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等，此外还教唱日本反战歌曲。在生活方面，他和队员们同吃一样的高粱面、小米饭加酸菜，同睡土炕，身上长了虱子用扫帚扫。当时生活很艰苦，斗争很激烈，但是慕韩同志整天总是乐哈哈的，他的乐观主义也深深感染了游击队员们，使游击队形成了一个活泼、团结、友爱、紧张的战斗集体。

这支游击队，1937年初建时只是一个支队，1938年又先后扩建了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由于加强了党的政治领导，又不断总结战斗经验，游击队队员的素质有了很大的变化，战斗力也日异增强，从而成为晋察冀边区打击敌伪势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一支有生力量。

晋察冀边区，是我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敌人的主要运输线——平汉、北宁、津浦、平绥等铁路。同时，也威胁着敌占区的中心城市北平和天津，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同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利刃，因而成为敌人疯狂进攻的重点区。仅1938年，敌人就对该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我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随之展开了对敌艰苦卓绝的战斗。当时，各界人士和广大人民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抗日烽火燃遍边区大地，给日寇的“扫荡”以沉重反击。敌寇武力征服不了我边区，就施展阴谋诡计搞所谓的“挖心”战术。

当时，在我边区曲阳县破获了一起“清乡党”案件。有一次，县抗日游击队查获到了一本“花名册”，并且上面还写有彼此互相联络的暗号。其中有名有姓的达三百多人。于是，曲阳县人民政府逮捕了其中的七十人，已定判死刑的有三十人。曲阳县政府上报请求边区政府批准执行。由于此案牵涉的人多面广，竟搞得人心惶惶，干部不敢接近群众，群众与群众彼此更失去信任，以至使抗日工作也趋向于消沉与停滞。

在边区政府党政领导研究处理“清乡党”的会议上，慕韩同志细致地审阅了曲阳县上报的文件和材料之后，在会上

又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敌我斗争现在正处于白热化，而我们边区军民的斗争性又是在日异高昂与激进之际，而只靠一本来历尚未查清的“花名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破获了这起案件，这是很令人怀疑的地方。而在这个花名册上，有许多是我们已经多次考验过的“堡垒户”，他们在“扫荡”中曾经舍生忘死地掩护过我们，为什么现在一下子就变到敌人方面？这不值得我们慎重思考吗？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些人是我们的干部家属，他们又怎么会甘心为日本人去卖命呢？这能使人相信吗？当前我们与国民党已经结成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只要真心抗日我们就联合，这是我们开展一切抗日工作的指导方针”。慕韩同志接着说：

“现在无论党内和党外的人，保家卫国，争取抗击残暴的日寇而获得胜利的爱国思想是非常明朗的，而且他们又生活在我们边区的土地上，上有老，下有小，怎能‘认贼作父’不顾全家老小的安全呢？当然个别的少数的敌特分子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他想不暴露也是不行的，即使干了坏事想跑，他也跑不了，跑了也能逮回来，不怕他兴风作浪”。最后，慕韩同志郑重严肃地提出：“我们党在任何时候处理案件都是重证据的，而现在不仅可疑点甚多，而且也无事实可以印证，因此，凡是定死刑的一律撤销，其余涉嫌人员也恢复自由，并且恢复他们的工作，待我们深入进行调查，反复核实，获得确凿证据，再作最后处理”。边区人民政府领导成员经过细致、深刻的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了慕韩同志的意见。不久，经过深入各个村庄，发动群众挖根寻底，才搞清真相。原来这是一起由日本头子三下洪文精心策划，通过汉奸景尚义具体搞的，即所谓“挖心”战术，